

2020

儒家倫理與現代西方倫理的異同：回應范瑞平教授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Modern Western Ethic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Ruiping Fan**

Qingxin Wa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epository.hkbu.edu.hk/ijccpm>



Part of the [Applied Ethics Commons](#), an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ommons](#)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epository@hkbu.edu.hk.

儒家倫理與現代西方倫理的
異同：回應范瑞平教授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Modern Western Ethic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Ruiping
Fan

王慶新

Wang Qingxin

王慶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北京，郵編：100094。

Wang Qingxin,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94.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年)：頁 127-13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127-133.

© Copyright 2020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bstract

This short essay takes up Professor Fan Ruiping's paper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modern Western ethics in light of the 2020 pandemic. Professor Fan argues that the reason China has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the pandemic is because Confucian ethics are better suited to a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an Western ethics are. As he suggests, Confucian family-centered ethics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obligations,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ose stringent lockdown measures to fight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This essay agrees by and large with Professor Fan's overall thesis, but it cautions against over-exagger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Western ethics.

范瑞平教授的文章（以下簡稱為范文）寫得非常好，非常及時。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性流行是對各國執政能力的大檢驗。正如范文所指出的，福山所強調的執政能力固然是應對疫情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應對疫情的唯一重要因素。各國應對疫情政策的倫理學基礎也是檢驗應對疫情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後者正是范文關注的重點。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國在這次疫情應對中取得可喜可賀的成績，而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至今仍是疫情重災區。福山認為中國的強大執政能力是關鍵因素，但是正如范文所指出的，儒家傳統倫理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可是卻被很多人忽視了。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儒家倫理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認識儒家倫理學相對於現代西方倫理學的優越性，需要思考為何大疫當前儒家倫理可以幫助我們國人成功應對疫請。

正如范文所強調的，儒家強調天命觀，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上天給予的並賦有特殊的道德意義。儒家強調生命的珍貴與尊嚴，認為仁義禮智是上天規範人類行為提高人類道德水準以期達到社會和諧的基本原則。並且儒家強調家庭和孝道在提升人類道德水準的重要作用，通過對父母家人的愛而推己及人，正如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並且儒家強

調天地萬物人神之間的相互感應，和諧與共時性。這些是現代科學因果性所不能解釋的，而正是儒家宗教的精髓。

范文認為儒家倫理優越於現代西方世俗倫理學的兩大理論：功利主義和義務論（道義論）。這兩個西方理論都強調利用科學方法建立普遍性倫理規則，所以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它們的倫理原則過分的規則化而不接受實踐檢驗，或者過分的教條主義，不接受例外情況。並且這兩個理論所強調的普遍化規律，以及對科學規律的絕對確定性的堅信，都容易導致極端主義。而儒家倫理，雖然也有規律性的原則，但它們來源於民間的長期的宗教禮儀實踐，人們行善的基礎是德，是人內心自發的仁愛衝動，而不是抽象的科學化和普遍化規則，而是強調實踐的時效性。比如在這次中國疫情防控的成功在於中國人都接受並且遵循了尊重老人的傳統習俗，為了保護老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接受嚴格防控甚至在疫情嚴重的城市採取了封城封街的嚴厲措施，所以取得了成功。而這樣的嚴厲措施在重視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美國是不可想像的。所以美國的疫情到如今都得不到控制。范文說得很到位，我很贊同。

范文強調儒家家庭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區別非常重要。這次中國之所以能夠接受嚴格管控主要是因為出於儒家傳統所強調的對老人的尊重和敬愛，如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非常贊同，我順著范文的思路再補充一點。絕大多數中國人在這次疫情中之所以能夠接受嚴格管控不僅是為了保護別人家的老人，也是為自身利益角度來考慮。儒家家庭主義對現代中國人仍然有著深刻的影響。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儒家思想遭受了嚴重摧殘，但是家庭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依然是生活的中心和生活的意義。大多數現代中國人雖然生活在城市裡，不再祭祀祖先，但是父母對他們來說，就像是祖先對古代中國人一樣重要，但是對於絕大多數的城市的中國人，他們只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城市移民，他們的父輩或祖父輩是從農村移居過來

的，他們對於父輩或祖父輩的農村傳統的記憶還是很近很親切。所以我認為，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父母代替了祖先為孩子提供了生命的意義。古代家族和祖先所承擔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仍由現代中國父母所繼續承擔著，也就是說，古代中國人認為他們是為家族而活，可以為祖先為父母為家族犧牲個人利益，而現代中國人是為父母而活，古代中國人可以為了祖先和家族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現代中國人可以為父母和家庭犧牲一部分自己的利益甚至自由。換句話說，當代中國人仍然受著儒家傳統的重要影響，或者說，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可以被稱為准儒家主義者，或半儒家主義者。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在當下疫情中絕大多數中國人願意接受嚴格管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與家庭休戚相關的，所以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了保護父母和家庭的生命安全，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為家庭犧牲一部分的個人利益和自由。這樣的思維可以被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保守主義所理解和接受，因為保守主義也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也強調個人為了靈魂的拯救而犧牲一部分利益和自由。但是對於現代西方世俗自由主義者來說，為了家庭和父母犧牲自己個人自由是很難接受的。

范文所說的精氣感應信仰不僅在漢代以前普遍存在，在宋代乃至現代中國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仍然普遍地存在。比如朱熹在描述子孫與祖先神的溝通時候，也是強調精氣感應。當學生問道為何孫祭拜祖先時可以感召祖先的靈，朱熹回答說：“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祖先）氣雖散，根卻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個當下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黎靖德 1986，48）

當然，范文也有值得商榷地方，我在此提兩個問題供參考和交流。

第一，正如范文所強調的，現代西方倫理學，比如功利主義強調最多人數最大程度幸福的原則，或者康德的絕對命令等抽象原則，或是西方生命倫理學中比徹姆和丘卓斯提出的四原則，與儒家的倫理原則確實很大不同。但是儒家倫理與近代西方倫理並不是完全的絕對的對立，而是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儒家倫理的目的是通過禮義創建一個充滿仁愛的和諧理想社會，但並不一定說儒家社會就一定充滿仁愛和和諧。啟蒙時代的西方思想家和現代西方思想家都希望通過對人權和自由的界定而建立和諧的理想社會。和很多古今西方思想家一樣，儒家聖賢也是認為人性有很多缺陷，所以孟子說“人之異與禽獸幾希”，人性雖本善，但後天的競爭環境使得人變得邪惡。荀子對人性的看法更悲觀，認為人性本惡，所以他強調人通過學習禮儀來化性去偽，強調禮的作用是“定分止爭”。所以他們都認為現實社會充滿邪惡競爭，要實現仁愛的理想社會是很艱難的。他們與西方啟蒙哲學家的區別是人需要擁有多少自由和權利，而不是人需不需要自由和權利。

再比如對人性和人的尊嚴的重視，對自由的重視，比如孔子的苛政猛於虎，國語的言論自由，孟子對人民推翻暴政的權利的肯定。自由與權利本身沒有錯，他們是各個民族與文明所共同追求的，自由與權利必須有邊界，需要責任來限制和約束。這就需要重新引入宗教信仰來平衡自由與權利，防止自由與權利走過頭，因為宗教可以給予人類生活的目的和責任。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為儒家的天命觀還在對中國人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讓中國人懂得如何節制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膨脹，避免中國人走向極端個人主義。現代西方自由主義受英國啟蒙哲學家洛克的影響很大，洛克所提倡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是有自我約束的自由主義。洛克所體現的加爾文神學與孔子的天命觀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洛克認為人的最終目的是靈魂在天堂與上帝合二為一，人在現世的自由與權利只是人實現其最終目的的必要條件與基礎，而不是最終目的本身，因為沒有基本的自由與權利。就不能履行他對上帝的責任，

也就是從事善行，爭取靈魂救贖。所以人必須有節制地有約束地追求自由和權利，而不應追求極端的個人主義。(Dunn 1982, 218)

但是現代世俗自由主義如羅爾斯的平等自由主義和諾齊克的放任自由主義已遠遠地偏離了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他們把人性抽象為只關心欲求和得失的自私自利的理性人的假設是非常片面的，間接地導致了極端自由主義氾濫。儒家倫理與這些現代世俗自由主義確實大相逕庭。

范文認為儒家的家庭主義天下觀與以契約為基礎的現代西方天下觀也有本質上的不同，比如儒家家庭主義追求的是關係，責任與和諧；而西方的契約主義強調個人的利益，自由，權利和國家主權。所以儒家家庭主義強調包容性的親情，關係，朋友，而西方契約主義強調排他性和競爭性，如朋友與敵人的對立的叢林世界。我很同意這樣的大致概括，但是我想強調的是這樣的中西文明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實際上，契約並不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中國文化裡也有契約主義的存在。周初統治者提出的天命觀其實也是一種統治者與上天的神聖契約，統治者如果履行好與上天的契約，以仁義對待百姓，那就有統治合法性，如果對百姓實行暴政苛政，那就喪失統治合法性。中國傳統婚姻也可以看作是夫妻之間的神聖契約，天和父母是契約的見證人，所以中國人的婚禮中需要一拜天而拜父母。所以傳統夫妻拜堂之後就承諾一生不離不棄。正如俗話所說，婚姻天註定。也就是說，婚姻和生孩子都是天所命定的，天也是婚姻契約的最終執法者(enforcer)。中西方文明不同的是對契約的強調程度有所不同。西方人強調契約多些，出於基督教傳統依靠上帝干預來強制執行契約，所以現代契約主義需要依靠法院或強力執行力的情況多一些。中國人的書面契約少一些，並且主要依靠口頭承諾，依靠個人內心的自覺履行承諾，而不需要外力的干預，所以歷史上中國的民法傳統比較弱，而西方民法傳統很強。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范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81-107。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81-107.
- 黎靖德：《朱子語類》，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LI Jingde. *The Compilation of Zhuxi's Conversation*, Book I (Beijing: The Chinese Book Publishing Bureau, 1986).
- Dunn, Joh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